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冯天瑜
主编

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

余子侠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冯天瑜 主编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

余子侠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余子侠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505-0

I. 山… I. 余… II. 陶行知—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435 号

出 版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 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430015 · 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4 印张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3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2505-0/K · 71	定价: 23.00 元
---------------------------	-------------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周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哲人王夫之将战国时期称之“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学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

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14—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4世纪,正式展开于18—19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内发内生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

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吸纳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19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着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20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反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落,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间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了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一 历史舞台上的“人民教育家”	1
1. 一个真实的场面	1
2. 一种特殊的舞台	6
3. 一段曲折的历史	12
二 故土成陶	19
1. 儒学开基	19
2. 初兼中西	25
3. 底色有成	29
三 金陵习行	34
1. 举步适时	34
2. 并蓄兼收	38
3. “知行合一”	45
4. 晓光初露	52
四 海外求知	60
1. “西洋”初渡	60
2. 真经心受	67
3. 活水流深	75
五 立足高校,初试教育改革身手	82
1. 历史舞台角色定位	82
2. 高校教改初显身手	91

3. 应时而动拓展领域	105
4. 前期理论工程的营造:试验主义 教育的阐释	118
六 尽心团体,谱写教育改进乐章	131
1. 教育改进事业中的全面出击 ...	131
2.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改进 ...	148
3. 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教育 ...	166
七 献身乡村,开拓教育改造新天地 ...	180
1. 敢拓“未开化的土地”	180
2. 乡村教育“破晓记”	190
3. 主体理论工程的建构:生活教育 理论的形成	219
八 拯危机探求新出路	246
1. 民族出路的探讨	246
2. 教育出路的求索	263
3. 政治出路的定向	279
九 为抗战积养新国力	305
1. 纾国难周游列国	305
2. 守正道苦酬三愿	331
3. 育英才养蓄国力	349
十 争民主再构新体系	377
1. 教育思想的最后升华	377
2. 教育事业的最后展现	396
3. 教育之光的最后归宿	410
附录一 陶行知著述目录	432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434
后记	437

一 历史舞台上的“人民教育家”

1. 一个真实的场面

1936年7月11日，早点时间刚过，在香港九龙太子道208号一间陈设简陋的寓所里，一位客居在此的学者正在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出洋行装，一边与身旁的两位小男孩交谈着什么。

“笃、笃、笃”，一阵很有礼貌的敲门声传来。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忙着跑去打开门。

“哈哈，嘉骅、嘉骝，你们又在这里缠着伯伯讲什么故事，是不是？”来人是一位年轻的记者。

那位学者这时才抬起头，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整了整自己身着的白绸长衫，朝年轻的记者笑了笑，打着手势招呼来人坐下，嘴里却忙不迭地解释：“哪里，哪里，我正感谢着他们哥俩哩。要不是他们帮我剪的剪、贴的贴，我哪能在昨天完成这出国前顶可纪念的一件事呢！”说着，他随手拿起饭桌上的一叠剪贴齐整的书稿递给记者：“是不是韬奋先生让你来取这个？多亏了他的两位公子，是他们所流的汗和他们的父亲的鼓励，才让我这第五本诗歌集赶在出国前编成！”

“呵，”年轻的记者忙说，“邹先生正赶着发新闻稿。这诗稿让嘉骅哥俩带给他们父亲吧。我是代表《生活日报》社特来采访先生您的，想请您将这次出洋的目的、任务作点说明。”

“是这样……，那好吧。嘉骅、嘉骝，那就请你们把它带去。”那位学者说着，即转身将诗稿交给那个叫嘉骅的小朋友，并顺手摸了摸小哥俩的头，和蔼地说：“请转告你们的父亲，就说我讲的，他太忙了，我上船时请他不必来送了。出国后我会给他来信的。嗯，伯伯也一定要给你们寄最好看的外国明信片，好吧？”

待小哥俩出门后，那位学者转过身来对记者说：“这一个国际新教育集会……”刚说到这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忙从靠窗口的茶几上取过一把“苍梧扇”向对方递去。这把扇子还是他前不久在广西宣传普及教育时，花了五个铜板买来的。当记者以“天不太热”推谢后，他接着说下去：“……与普通国际教育会议不同，它系国际上对教育有一种新的信念的人的研究与交换意见的机关。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每年的集会讨论当前世界上的一切实践的问题，一个新的教育者应如何用教育的工具去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故在这一会议中，一切有关世界的大势的问题无不谈到，并不限于狭隘的教育。”

说到这里，记者乘隙插问了一句：“先生您有无具体提案？”

“有的。不过，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藉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的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造中国的实践。我除开准备提出太平洋集体安全一个问题供大会讨论外，其他的问题，候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后，有意见发表时，再临时灵活的作议案提出讨论。”

为了让记者了解到这次出洋旅行的大致行程，那位学者接着告诉对方，大会开会的时间定为两周，但自己只能在伦敦逗留一周，以后准备作世界旅行，先访英、法、德、意、土、苏联等国家，然后再去美国，为时共约半年。见记者兴趣正浓，他补充

说：“这一次全部旅行的目的与任务，大致和以上说的相同。不过到处跑跑，自然主要是考察人家的新教育、新文化，同时想访问世界凡关心太平洋问题的人士，彼此交换一点对于太平洋集体安全的问题的意见。”

谈话进行了十多分钟，记者见学者的精神甚健，想到对方是直接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工作的人，最近又遍游西南，对全国抗战救亡的现实比一般人了解的多，有心想听听他对于联合战线这一救亡政策问题的意见，于是把话题转到了联合战线上来：“先生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袖，此次又遍游了西南，不知对于联合战线这一救亡政策，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确实多跑了一点路，看得更清白一点，真新的意见倒不多。……不过，我以为要救亡，必要抵抗。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呢？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全国不想做亡国奴的人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所以我们要提出联合战线来，并且认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惟一方策。这是没有疑问的。”停了一会儿，那学者又笑着说，“我还有点补充，联合战线也就是缩短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消除，使过去在政治上有怨仇的人，甚至汉奸，都给他们一个悔过回头的机会，减少敌人几千几万的队伍，增强自己方面几千几万的队伍。”

“怎样使过去在政治上有怨仇的人都来参加呢？何况……”

显然对记者要问的问题已成竹在胸，不待记者将所问的问题加以任何补充性说明，那学者即应声答话：“联合战线自然是把过去有仇有怨的人拉拢来，大家共同对付强盗，如果本是志同道合的人，那还要谈什么联合。对过去政治上有怨仇的人，是不算过去的烂账，只问现在你肯干不肯干。”

“那么依先生之见，联合战线目前应该在政治上怎样开展？”

短暂的沉默后，只见那学者以自己往常演讲的惯用手势，向

记者掰算着自己的指头：“自然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三大实力系统：南京国民政府的 200 万大军、西南及红军。这三大实力联合起来，已经超过日本的军力，这里有现成的武力 300 万，其他的经济力也抵得过。不仅这三大实力合拢起来已很有可观，还有民众呀！这三种系统实力都开放民众运动，那还了得，中国救亡阵线的伟大，要惊耀世界。”

谈到这里，两人都异常兴奋起来，仿佛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那排山倒海的抗战力量。这时记者又无不耽心地问道：“要怎样才能使这三方面拉手呢？”

“这三方面不拉手，来互相抵消自己的实力，那只是大家倒霉，当亡国奴的一条路。要怎样才能使他们拉手呢？要人民出来作发起人，公正的、无党无派的人出来作和事老，自己要任劳任怨，不顾一切出来发起这三方面拉手！”

听到这里，记者不由得用敬佩的目光凝视着对方，心里在想，这哪里像一个从事教育的学者说的话，那些所谓政治家们，如果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胸襟，那我们中国的事就要好办得多。于是顺着对方的思路问了一句，“先生愿意出来作一个发起人么？”

“可以！”对方毫无推谦之意：“现在不能只图个人清高，不能闭着眼睛不管事了。不出头说话，那怎么办！不过，这要具体的谈，说来话长，以后再谈罢！”

记者接着转换了一个问话的角度：“在联合战线结合时，有人主张打开大门，先生以为怎样？”

“这与以上说的相同，自然不能再关闭救亡的大门，不过打开大门的解释，应该是打开战场上的门，不是开门同居。任何人要参加到战场上来，不要拒绝它。又好比一个船在海中风平浪静时，不管你是主张新文学的一派，我是要保全国语、方块字的一派，大家夹七夹八，但这船遇盗了，主张新文字也好，方块字也